

# 美国 U 型收入分配格局： 演变历程、形成机理与当代启示<sup>\*</sup>

◎ 王伟 李鹏

**摘要：**百年来美国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格局经历了收入差距拉大、短期明显改善、再次扩大并加剧分化的 U 型动态演变过程。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造成其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危机后的政府主动修复无法改变美国长期贫富分化的趋势，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美国经济金融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进而产生了国内劳动者就业与收入恶化、产业转移与空心化、经济虚拟化、社会阶层固化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后果。因此，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收入分配改革应注重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避免脱实向虚，平衡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兼顾效率与公平，加快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

**关键词：**美国收入分配；贫富分化；公平与效率；经济金融化

中图分类号：F113.9

文献标识码：A

1955 年，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自然会导致更大程度的平等。他用美国、西欧等国家的数据进行了验证，提出了一国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而变化的库兹涅茨曲线，又称倒 U 曲线（Inverted U Curve），即在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初始阶段（比如美国 19 世纪的镀金时代），收入分配将出现严重的不平等，随着经济逐步发展并趋于完善，市场经济创造的财富效应在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分配将更加平均，最终整个社会将达到一种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态。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 20 世纪 70 年代后美国社会贫富差距再次拉大的现实颠覆了库兹涅茨假说。2014 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 世纪资本论》一书中证实了李嘉图、马克思和其他 19 世纪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收入分

作者简介：王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李鹏，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为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

\*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党的领导与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和机制研究”（22STA041）的阶段性成果。

配机制的看法——“它不仅不公平，而且是无情的、动态的不公平”（Faux, 2014）。当前，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连续 100 多年高居世界第一。2023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达 27.37 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总额的 1/4，自 20 世纪 30 年代 GDP 概念提出以来，美国的 GDP 全球占比从未低于 20%。在美国经济体量强势增长的背后，一个无法掩盖的问题是：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贫富分化现象最为严重，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企业高管与普通工人之间，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过去 30 年里，美国前 10% 的家庭总财富从 24.3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82.4 万亿美元，增幅达 240%，前 10% 的家庭拥有的总财富量达 72%，其中，最富有的前 1% 的人群拥有了超过 1/3 的总财富。贫富严重分化引发了社会撕裂、政治失序、金融投机等一系列经济社会乱象。

实际上，美国的贫富分化问题由来已久，并非只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现象。百年来美国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格局经历了收入差距拉大、短期明显改善、再次扩大并加剧分化的 U 型动态演变过程，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本文从历史长周期的角度，立足于美国收入分配格局 U 型演变的历史进程，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系统阐释了贯穿其中的形成机理，揭示了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据此针对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和经济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

## 一、百年来美国收入分配格局的 U 型演变历程

### （一）20 世纪初至“大萧条”前——收入差距维持高位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高速增长阶段，这一时期美国开启了以内燃机革命及电力革命为标志的科学技术革命，以当时的世界最高水准实现了近代工业化，完成了由近代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顺利赶超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形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自由资本主义推动企业间竞争加剧，少数采用新技术的企业

击垮了大量技术落后的企业，从而促进了生产和资本的快速集中，生产和资本集中到一定程度便产生了垄断。大量的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大资本家手里，美国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从 20 世纪初至“大萧条”期间，美国居民的收入差距维持在高位水平，社会贫富悬殊，该时期的美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结构。1917—1929 年，美国家庭财富的实际增长率为 1.8%，其中，前 10% 的家庭财富增长率为 2.3%，后 90% 的家庭财富不增反降，增长率为 -0.4%，而处于“金字塔”尖的前 1% 家庭财富的增幅却高达 3.6%（Saez, Zucman, 2016）。可见，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发展并未带动各阶层收入的普遍增长，财富的聚集效应主要集中在富人阶层。从财富集中度来看，该时期前 1% 富人阶层的社会总收入占比一直稳定在 17%~22% 的高位水平，远远超过后 50% 中低收入群体约 14% 的占比。虽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影响，前 1% 的富人阶层收入短暂出现了下降，波动有所加大，但这两类群体收入变动情况的走势相对一致，并未出现明显背离和分化（见图 1）。在“大萧条”前，美国国内的居民税前收入基尼系数（Pre-tax Income Gini）常年维持在 0.55 以上，并不断震荡走高，最高至 0.6 左右，远远超过 0.4 的国际贫富差距警戒线，凸显了当时美国国内居民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见图 2）。从家庭财富的构成情况来看，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是前 0.01% 的顶级富豪家庭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高峰时在社会家庭总财富中的占比超过了 20%；而其余 90% 的家庭其资产构成主要是厂房、机械设备等有形固定资产和养老金资产，股票债券类金融资产占比较低（见图 3、图 4）。家庭财富构成的差异决定了富人阶层更易获得资产的增值效应和经济增长红利，从而拉大了贫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

### （二）“大萧条”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收入分化情况出现改善

“大萧条”后，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施行“罗斯福新政”以解决空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新政摒弃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通过强化政府全面干预

图1 美国富人群体与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份额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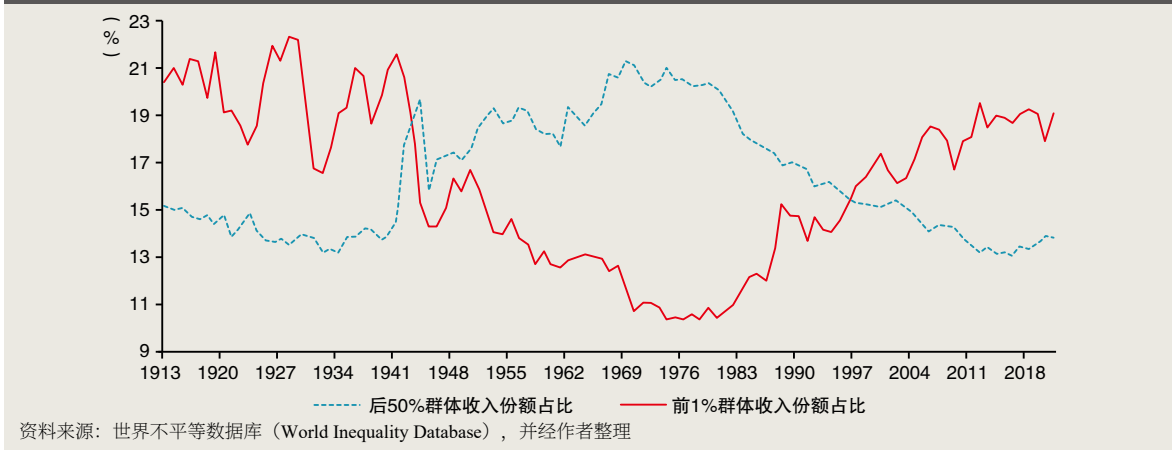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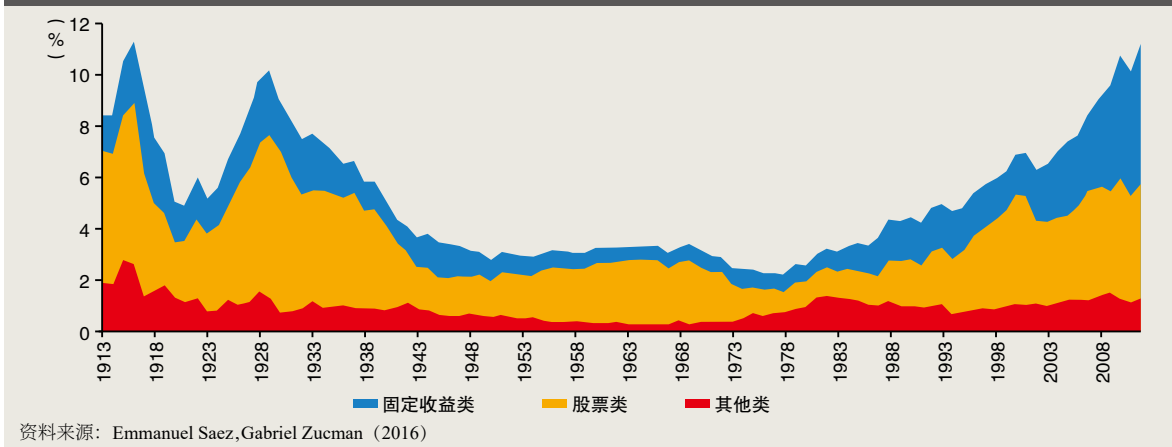


图2 美国居民税前收入基尼系数变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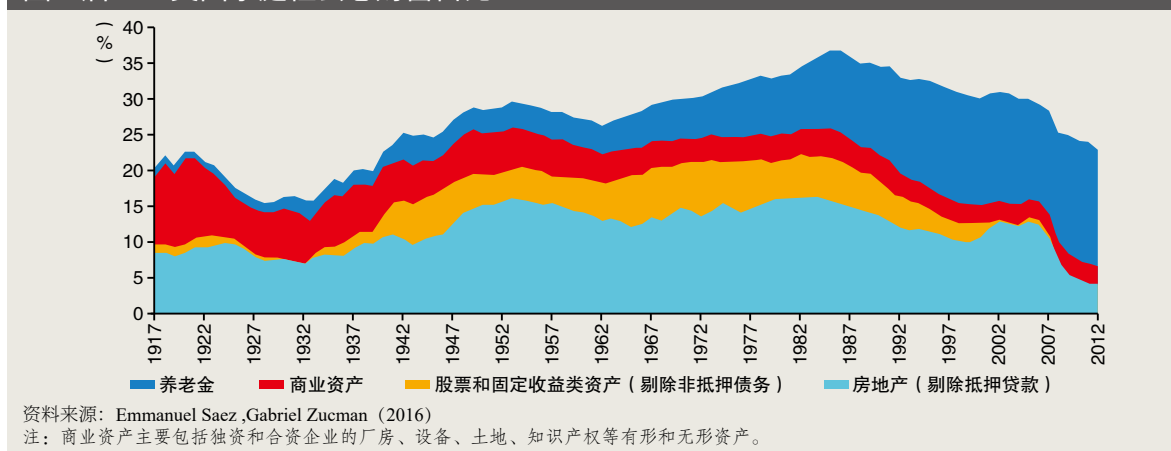
图3 前0.01%美国家庭社会总财富占比



金融、工业、农业、公共工程、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缓解了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使垄断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奠定了美国战后世界霸主的地位，二战后至20

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迎来了又一“黄金时代”，投资和产出保持高增长，劳动力市场就业充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在此期间，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航空航天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科技革

图4 后90%美国家庭社会总财富占比



命在美国兴起，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国家和国际垄断组织纷纷成立，实现了从近代工业化向现代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转变。

这一阶段，美国政府从罗斯福开始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提上日程，主动增加公共支出，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大胆抑富济贫。杜鲁门时期的“公平施政”允诺要让每一个美国人都有机会从美国日益增长的财富中得到一份公平。1950年，工资工时法生效，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了75美分；同年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将退休工人养老金平均增加了77.5%。二战后，托马斯·约翰逊的“向贫困开战”和“伟大社会”构想将美国的社会保障又推向新的高度。1964年，政府又通过了经济机会法案、新住宅法案和食品补助法案，力图缓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缩小收入差距。在国家财力逐步增加的基础上，尼克松时期“新联邦主义”设立了“家庭援助计划”和“补充保障收入计划”，统一由政府承担贫困家庭的生活津贴和没有工作能力的成年人的经济补助。通过历届政府的累进税制、强势工会、最低收入保障等一系列政策安排，处于基本生活线以下的贫苦大众生活明显改善。机会平等造就了相对顺畅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了“美国梦”，中等收入阶层扩大，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大大缓解。

该时期美国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明显的“橄榄模式”结构，形成了“中产阶级的美国”。如图1所示，“大萧条”和二战后，前1%的富裕阶层收入占比下滑严重，从前期的20%多一直跌至12%左右，

而后50%的中低收入群体规模则不断增加，其收入份额的社会占比大幅提高至20%以上，两类群体收入变动情况的走势形成了显著背离。从收入不平等程度看，美国的居民税前收入基尼系数从1934年的0.603最低降至1974年的0.443，该时期基本稳定在0.47附近，反映出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有所缓解（见图2）。持有大量股票等金融资产的美国家庭在经济危机和战争中损失惨重，财富大幅缩水，前0.01%的超级富豪家庭金融类资产的社会总财富占比降至个位数；而随着社会福利政策的改善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绝大多数美国家庭充分享受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红利，后90%的家庭各类资产占比均较之前有了显著增长，其中，养老金资产的占比在70年代超过了30%（见图3、图4）。

### （三）20世纪80年代至今——收入差距再次分化并加剧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滞胀危机，里根上台后推行新自由主义，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大规模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投资，削减社会保障补贴，推行“弹性劳动力市场”。90年代，美国经济重回正轨，开启了以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革命，创造了“低失业、低通胀、高增长”的“新经济神话”。但是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隐忧不断增加，国内垄断资本依托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重构产业链、供应链，国内制造业生产部门大量迁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金融化、虚拟

化、泡沫化现象严重，最终爆发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危机后，历届政府虽然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从奥巴马的“再工业化”重塑国内产业资本循环，到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贸易战”和“美国优先”，再到拜登的“重建美好方案”，但都无法实质性扭转美国经济动能下降、衰退压力增大、全球霸权日渐衰落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的整体取向上更加重视控制通货膨胀率，而相对忽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就业和收入分配改革，导致工人阶级利益受损，谈判力量弱化，富人与中低收入阶层的差距再次扩大，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和“中产阶级遭挤压”的严重现象。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发布的家庭财富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所有家庭的财富存量合计115万亿美元，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倍，家庭财富中值为16.85万美元。从1989年到2019年，收入最高的前10%的家庭所拥有的社会总财富占比从63%提高到72%，前1%超级富豪家庭从27%增长到34%。相比之下，后50%中低收入家庭拥有的财富占比从4%下滑至2%。自1988年以来，金字塔顶端最富有的前0.01%家庭平均财富以年均7.8%的幅度高速增长，1978年前0.01%的超级富豪家庭财富保有量是普通家庭的220倍，到2012年这一比例扩大到惊人的1120倍。

从群体收入占比的变动情况来看，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前1%的富裕人群收入份额占比急速飙升，而后50%的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份额占比则从高位的21%急速下降，两者走势加剧背离，收入分化情况回到了20世纪初的水平（见图1）。居民税前收入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453涨至新冠疫情期间的0.581（见图2）。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跟踪研究显示，1978—2022年，美国公司CEO阶层的收入增长率达1209.2%，而同期普通工人收入仅增长15.3%。从阶层财富构成情况看，由于经济发展中金融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最富有的前0.01%群体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股票和固定收益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推动，其社会总财富中的占比已超过约15%；而后90%的家庭中，养老金资产的社会总财富占比自

70年代中后期的35%逐渐回落，金融类和商业类资产则急剧萎缩，跌至20世纪初以来的新低（见图3、图4）。

## 二、美国收入分配格局U型演变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美国收入分配格局U型演变的“路径依赖”特征是由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矛盾所决定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劳资双方的根本对立。虽然面对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和贫富分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冲突，美国政府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税收等措施进行了主动修复，但这并没有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反而在新自由主义经济金融化的推动下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

### （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

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和根本动机是最大限度地榨取雇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美国式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劳动采用雇佣劳动的形式，生产资料采用资本的形式。“使劳动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目的，这就为资本主义生产中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分离准备了条件”（胡莹，2013）。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索取和占有是美国贫富差距扩大进而引发资本家阶级与劳工大众阶级对立的根源。美国社会诸多大财团、大垄断企业主掌握着大量生产资料即资本，而普通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商品出卖给资本家用以维持自己的日常生计，这样，资本就发展成为对雇佣劳动的强制性的指挥权。在价值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而在价值分配过程中，劳动者却不能获得自己生产的全部价值。马克思指出，资本增值的秘密在于资本“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力越旺盛”。因此，资本家凭借对劳动力的支配地位无偿占有了雇佣劳动者创造

的剩余价值，劳动者在价值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中的不对等关系导致了美国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贫富差距。

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过程和剩余价值资本化的积累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果必然“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把自己的产品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正如20世纪初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美国企业为了在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中占据优势地位，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必然竞相采用先进的技术和机器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由此必然使不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日益增加，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利润率趋于下降。而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超额利润，就需要资本不断进行积聚和集中，这样，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资本家手里，形成垄断资本的统治，劳动者则作为被剥削的对象，成为机器的附属品，社会出现大量“产业后备军”，失业率飙升，工人生活状况日趋恶化。

## （二）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后的主动修复无法改变美国贫富长期分化的趋势

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差不多每隔10年就会发生一次规模或大或小的经济危机。针对资本积累内部矛盾的危机倾向，马克思主义知名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过剩积累危机“最典型的特征是接踵而至的资本盈余（以商品、货币或生产能力的形式）和劳动盈余，以及没有任何明显的方式可以将它们在盈利的基础上集合起来完成一些对社会有益的工作”。为此，他提出了“时间—空间修复理论”，论述了“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方法”。“大萧条”后，美国政府不再固守“守夜人”理念，主动采取减税、扩大投资、加强信贷投放等措施来刺激经济复苏，并综合运用累进的遗产税、促进就业、社会保障等手段积极修复贫富分化的社会矛盾，推迟资本价值

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同时通过跨越地理界限，开拓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等进行空间转移。

虽然周期性经济危机后美国政府主动进行时间和空间修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收入分配上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兼顾公平”，但这些主动修复的背后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是维护美国大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需要，所以，这些修复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积累悖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经济“强资本”“弱劳动”的对抗性矛盾。由于美国的分配关系建立在对抗性的基础之上，生产力的提高所带来的大部分成果都会被资本家所占有，导致社会财富占有状况的两极分化，剩余价值的实现将愈发困难，随之出现资本过剩和人口过剩，这又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自身矛盾与经济危机的频发。时间—空间的修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因而美国贫富分化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 （三）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经济金融化是造成美国贫富差距扩大加剧的重要推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进入“新自由主义时代”。新自由主义使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变革，从“受约束的资本主义”转向“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呈现出“去政府化、私有化、经济完全自由化和福利个人化”的典型特征（陈波，2021）。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势加剧，泛金融行业FIRE（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业）超越工业制造业及其他行业，成为发展最快的核心产业。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也是资本积累金融化的过程，资本的分化引发了产业资本积累和金融资本积累的分化，亦即“福斯特双层积累体制”。“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本质是金融部门的资本通过加入到实际产业资本循环中去分割产业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并通过金融市场交易形成相对独立的虚拟资本循环，借助于信用扩张和剥夺其他投资者本金的方式获得相应的金融利润”（于阳阳，2022）。最终垄断金融资本凭借其支配地位，大量攫取实体经济创造的物质财富，形成了美国资本主义掠夺性再分配的新模式。

首先，美国经济金融化的信用扩张机制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金融资本运行过程中资金的投放、信贷的扩张要求以微观主体的信用资质为依托，以利率为媒介，这一运行机制天然存在着财富的分配效应。一方面，当利率降低、信用扩张时，富裕阶层由于财富实力较强，因而信用等级越高，获取的财务杠杆越大，就有利于获得更多投资收益，而大多需要资金的低收入阶层因信用等级很低，无法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当经济过热、信贷收缩，拥有大量储蓄的高收入阶层会因利率上行而受益，而普通民众因储蓄很少，所以获益甚微。

其次，美国经济金融化通过金融衍生品创新进行“金融掠夺”（Financial Expropriation）。美国经济金融化的高度发展伴随着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大量创新，金融机构和各阶层民众都广泛融入其中。一方面，高收入阶层凭借雄厚的资金基础、知识信息优势，抗风险能力更强，可以借助金融资产膨胀的机会快速扩大财富积累，而中低收入阶层并不具备这些优势而错过了发财致富的时机，甚至因为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加杠杆和市场的剧烈波动导致更大损失；另一方面，金融资本抓住民众的消费主义倾向，在工人工资下降时，以消费信贷的形式将其收入资本化，无形中延长了工人工作时间，平滑了劳资矛盾，加剧了金融掠夺。

最后，美国经济金融化使企业更注重股东价值，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经济金融化促使企业管理者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公司治理和收入分配时倾向于向股东更多分红派息，减少留存收益用以扩大再生产。结果是：一方面，提高了金融机构股东的收益，推升了金融从业者收入，而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有限，甚至赶不上通货膨胀增长的速度；另一方面，委托代理机制下，企业管理层在股票期权的激励下有机会进一步拉大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此外，很多家族资本控制的公司倾向于削弱工会的力量，普通劳动者的地位更加难以保障。

### 三、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经济与社会后果

美国贫富差距扩大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后

果，导致政治危机加剧，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黑人的命也是命”大游行，反映出广大社会民众对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

#### （一）就业和收入恶化，中低收入阶层消费需求增长停滞

在国民收入整体增长的趋势下，美国贫富差距扩大在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普通劳动者就业的低迷和工资收入增长的乏力。垄断资本因其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使得公司利润的增长明显快于工人工资的增速。最近40多年，美国公司利润的平均增长率约为9.76%，远远高于职工报酬6.5%的增长率，公司利润与职工报酬之比由1970年的19.7%增长到2013年的35.82%，显示出垄断资本参与国民收入分配越来越多，对劳动力报酬形成了巨大压榨与挤占。阿扎尔、贝里和马里恩斯库的研究验证了垄断资本对就业市场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程度，他们发现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他们实际获得的工资要高出17%（Azar, Berry et al., 2019）。韦伯进一步分析指出，美国公司的市场垄断力量对工人工资的负面影响对后50%的中低收入工人和女性工人影响最为显著，这表明垄断资本的势力放大了整体和性别工资的不平等（Webber, 2015、2016）。从收入分配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公司资本的力量可以极大地改变最低工资或工会组织等制度安排的效果，最终形成明显的负反馈效应。

1979—2021年期间，美国收入最高的前1%群体和收入最高的前0.1%群体工资分别飙升了206.3%和465.1%，后90%群体的工资仅增长28.7%。2020年，后90%群体只拿到了全部工资的58.6%，这是自1937年有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远低于1979年的69.8%（见表1）。在新冠疫情期间，贫富差距的扩大进一步恶化了普通中低收入者的生活状况，因为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大多可以通过线上远程办公，而普通工人因居家隔离、社交受限无法正常参与到生产当中，疫情后80%的失业人口都集中在后25%的低收入群体中（Gould, Kandra, 2022）。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数据显示，2020年有15%的美国成年

表 1 美国各群体工资收入及变动情况 (美元)

	1979 年	1989 年	2000 年	2007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979—2021 年 (%)
后 90%	28415	29289	32770	33814	36655	36660	36571	28.7
前 5%	142159	194873	270682	288048	308487	322349	335891	136.3
前 1%	267464	444731	662488	696316	705887	748662	819324	206.3
前 0.1%	586222	1374624	2621271	2688346	2564364	2795589	3312693	465.1
平均工资	36639	40430	48532	50689	54877	55731	56195	53.4

资料来源：美国社会保障局 (United State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并经作者整理绘制

人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失业，其中：低收入人群的失业率为 28.2%，中等收入群体为 13.8%，高收入群体比例仅为 7.8%。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不足，失业率的增高，导致中低收入者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大大减少，一些困难的家庭甚至要完全依赖政府救济才能维持基本生活，因此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很低，美国家庭的平均储蓄率由 2000 年的 4% 左右增加到 2019 年的 8% 附近，穷苦大众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甚至停滞，影响了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 (二) 实体投资停滞，产业转移和空心化问题明显

资本的无限增值本性决定了当出现“积累悖论”时，过剩的资本必将从职能资本中分离出来参与全球市场资本循环或在本国国内“脱实向虚”寻求新的增值土壤，引起贫富差距扩大，导致国内产业资本循环不畅和产业转移后的空心化问题。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比较稳定，呈轻微下降趋势，制造业的贸易逆差在亚洲金融危机前也从未超过 1310 亿美元。1970 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 24.3%，是 2018 年的两倍。1970—2000 年，美国制造业吸纳就业人数总体保持在 1700 万~1800 万人之间。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进程中，美国国内资本通过在新兴市场国家大肆组建跨国公司将国内价值链低端的一般加工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市场，充分利用新兴市场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土地、原材料、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扩大对剩余价值的积累和占有。全球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就业和经济增长，而在此过程中美国国内却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制造业对外贸易逆差、制造业就业严重下滑等问题。自 1997 年以来，美国净损失了 91000 多家

制造工厂和近 500 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在 2016—2018 年特朗普执政期间，有近 1800 家工厂消失。从 1998—2018 年，美国的制造业工厂每年都出现净亏损。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贸易逆差开始急剧上升，制造业贸易逆差在 2006 年达到了 5585 亿美元的峰值，约占 GDP 的 4.1%。2020 年制造业贸易逆差更是达到 8977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占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总额的 98%，占美国 GDP 的 4.3%（见图 5）。当前，美国制造业总产值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滑落至 12.4%，始终无法恢复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美国制造业总产值在世界的占比也从 1970 年的 40% 下降至 17.4%。

## (三) 金融投资盛行，经济虚拟化加速

伴随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是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程度不断加深，金融投资盛行，高收入人群主动加大杠杆增加金融产品的投资力度，力求获得更多资本增值收益，而中低收入群体因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创新和期望快速扭转贫困现实的冲动也积极参与其中。许许多多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在各类金融中介和金融产品的联结下形成一条条错综复杂的信用链条。对冲基金、金融期权、杠杆并购、违约互换、信贷抵押证券等金融衍生品创新眼花缭乱、层出不穷，美国金融市场虚拟化加速。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 FIRE 部门（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业）行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仅为 12% 左右，远低于制造业 25% 以上的占比。80 年代中后期，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快速上升，1990 年美国 FIRE 行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了 18%，首次超过了制造业的贡献水平。此后，金融相关行业增长势头不减，2020 年占比达到了 21.6%，再创历史新高（见图 6）。金融行业在美国



图5 1997—2020年美国国际贸易逆差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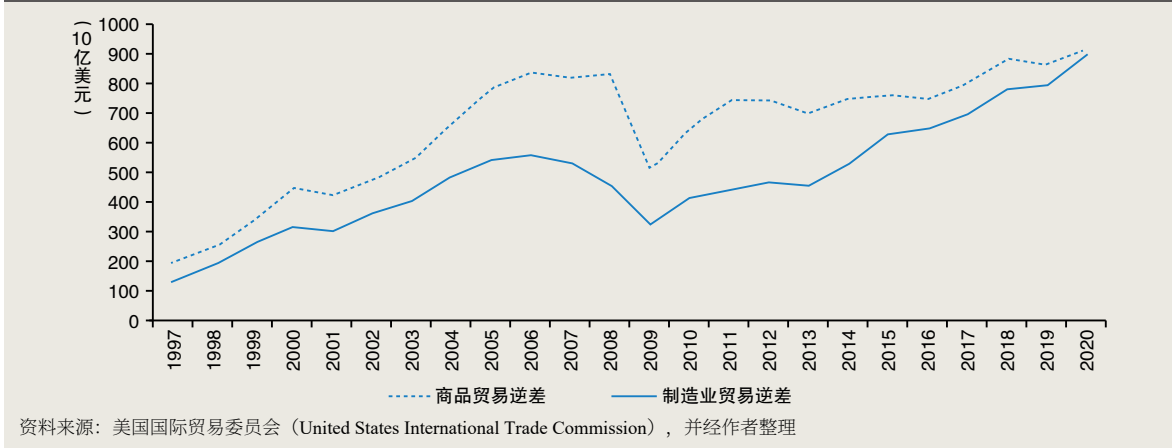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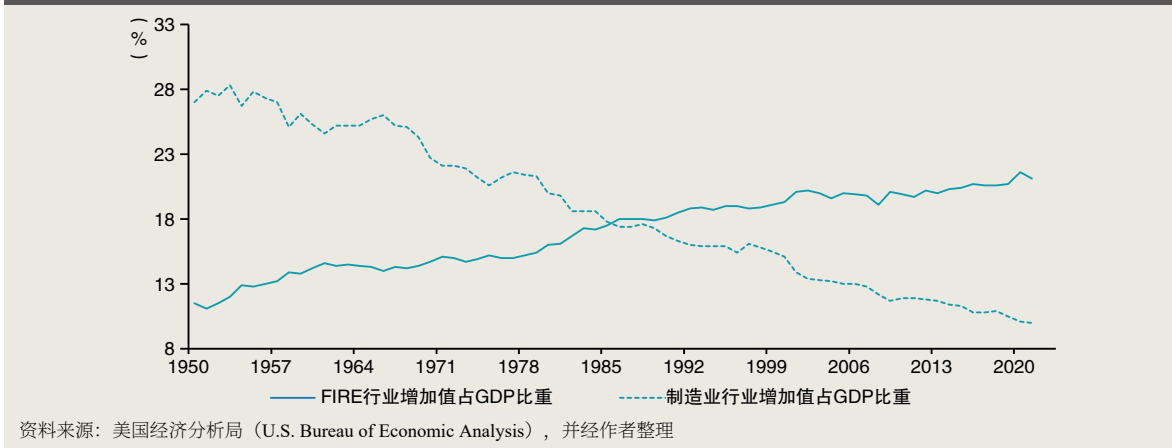


图6 1950年以来美国FIRE和制造业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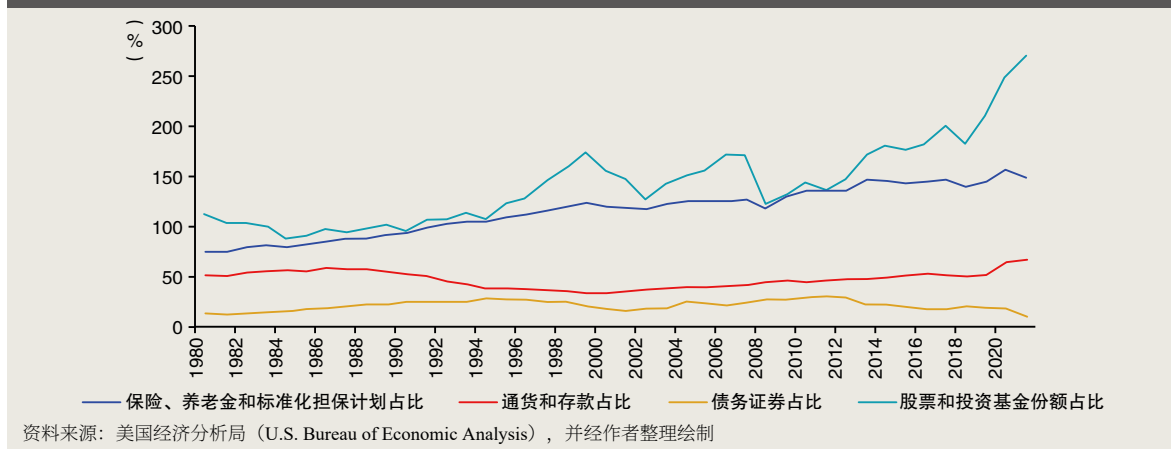
经济总利润中的占比也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快速修复,近年来持稳于25%以上。金融行业快速扩张的背后是基础货币的超发、家庭债务负担沉重以及金融衍生品发展失速、失序,美国未季调的基础货币数量从2008年1月份的8306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12月份的64131亿美元。美联储近期发布的家庭债务和信贷季度报告显示,2022年第四季度美国家庭债务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6.9万亿美元。美国货币监理署(OCC)披露的数据显示,作为全球金融衍生品最为发达的国家,截至2022年年末,美国衍生品存量合约名义本金为191万亿美元,约占全球总规模的30%。近40年来,美国居民和非营利机构持有的股票和投资基金资产份额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112%增长至2021年的270%,翻了两番,而同期通货和存款资产的占比则增幅很小,仅从52%增长到67%(见图7)。

#### (四) 阶层固化与中产阶级消亡

美国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了阶层分化,进而出现了社会阶层严重固化的问题。1971年,有61%的美国家庭被认为是中产阶级,但到2021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0%。阶层固化意味着社会底层向上流动会面临“天花板”,同时上层阶层会极力维持自己所在的层级,防止后代滑向更低层级。评价一个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指标有两个:一是绝对流动性;二是相对流动性,特别是代际流动性。

在绝对流动性方面,切蒂、亨德伦和古尔斯基通过对比孩子30岁时的家庭收入与其父母30岁时的家庭收入来衡量绝对流动性发现:1940年出生的孩子有大概90%到30岁时会超过其父母同期的收入水平,而对80年代出生的孩子而言,这一比例降到了50%,并且绝对收入流动性在整个收入分配格局中均有所下降,但中产阶级降幅最大。过去半

图7 美国居民和非营利机构部门各类金融资产占GDP比重



个世纪，绝对流动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分配更加不平等，而不是经济总增长率放缓（Chetty & Hendren & Grusky, 2016）。

从代际流动性指标来看，如果社会是机会平等的，那么一个孩子出生的家庭财富状况对于其后天的财富状况的影响程度不会很大。据统计，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美国社会真正实现了收入增长和阶层跨越，跳出父母阶层的人口只有不到1/3；而能够实现连级跳跃，逆袭进入富裕阶层的概率仅为4%。切蒂、亨德伦和克莱恩用父母和孩子收入情况的相关性来衡量代际流动性研究发现：1971—1993年出生的孩子代际流动性比较平稳，代际流动性与社会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中产阶级的不平等所驱动，目前“出生彩票”（Birth Lottery）对于未来孩子的收入状况影响越来越大。尽管美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但当前美国富人的年龄比半个世纪前更年轻（Chetty & Hendren & Kline, 2014）。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巴马政府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克鲁格（Alan B. Krueger）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认为美国社会的高度不平等造成了代际流动水平较低，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sup>①</sup>（The Great Gatsby Curve），个人的经济状况将更多由父母的经济地位决定，造就了“世袭的精英”（Hereditary Meritocracy）群体。

## 四、美国收入分配格局 U 型演变对中国的启示

### （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避免脱实向虚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充分肯定了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两种扩大资本的方式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极大促进作用，同时他也深刻指出，由于“积累悖论”，货币资本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催化下会出现脱离产业资本循环，追求自我循环、自我增值进而压制产业资本的现象，最终势必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过度金融化、虚拟化的具体体现。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金融与实体经济的适配性仍有待提高，部分中小实体企业“融资难”问题依然存在，经济“资产荒”问题较为严峻，金融行业增速超过实体经济增速，金融资产收益与实体经济利润背离，出现了金融体系内部资金空转、脱实向虚、忽视风险片面追求高额利润回报的倾向。虽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和互联网金融平台等领域的风险仍不容忽视。

为此，金融行业要主动回归本源，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传统行业加速转

<sup>①</sup>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The Great Gatsby Curve）由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克拉克首先提出，用以说明高度不平等的国家通常具有较低的代际流动性，亦即子女可以通过继承父母的财富保持与父辈同等的社会阶层。

型升级，助力新兴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形成“产业—金融”的良性互动，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融基础。积极参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加大对内需和供给体系的支持力度，满足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多样化融资需求，激发微观经营主体活力。充分发挥金融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助推消费升级，激发消费潜力。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大力拓宽融资渠道。强化金融监管，规范金融秩序，建立健全金融稳定发展协调机制，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 （二）平衡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兼顾效率与公平

在美国资产阶级公平观的价值体系中，社会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和现实必然，只要将垄断资本控制在合理限度内，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下社会再生产的效率可以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不可否认，历史上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和手段对缩小社会收入差距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以剥削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市场和政府职能的界定中往往顾此失彼，左右摇摆，无法真正做到效率与公平的有效统一。

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实现的效率所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同样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又要求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协同并重的机制。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极大调动了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了起来，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社会收入差距有所拉大的现象。但是我们先富的前提是要帮助后富，通过社会化大生产的更新迭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所追求的共同富裕既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

主义，也不是美国式的差别富裕，而是机会平等、过程公平、结果共享的共同富裕。事实证明，搞平均主义实现不了共同富裕；只顾效率而弱化公平的发展也会步美国贫富分化的差别富裕老路。唯有将市场保效率和政府促公平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和更有效率的发展。

## （三）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全民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初级阶段迈向新的更高阶段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机制主要存在初次分配差距扩大、再分配“逆向”调节不足的问题，为此，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优化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

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发挥工资的激励保障作用，保证广大劳动者充分享受生产率提高的报酬增长红利，实现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健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增加中低收入者的要素收入和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升劳动者技能，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促进社会充分就业。

在二次分配中，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调节力度，规范社会财富积累机制。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和监管，适当扩大直接税占比，坚决取缔非法收入，适时出台遗产税、赠与税以调节存量资产差距。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全覆盖，规范发展企业年金等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统筹城乡救助扶贫体系，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化救助需求，提高社会救助标准，保证政府兜底提质增效。

在三次分配中，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的主体作用，健全公益捐赠、税收优惠、志愿服务等相关法律制度和配套设计，鼓励高收入群体在自



愿的基础上以捐赠、资助等公益方式参与社会财富再分配，形成对初次和二次分配的有益补充。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0-780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72-273
- [3] 陈波. 经济金融化与共享发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38-41
- [4] 哈维. 新帝国主义[M]. 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3-94
- [5] 胡莹. 美国的收入分配和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92
- [6] 于阳阳. 资本主义金融化视域下美国经济治理的失灵[J].当代经济管理，2022，44（11）：87-96
- [7] Azar,J., Berry,S., Marinescu,I. Estimating Labor Market Power[C]. NBER, 2022：19-38
- [8] Chetty,R., Hendren,N., Grusky,D. The Fading American Dream: Trends in Absolute Income Mobility Since 1940[C].NBER, 2016:8-18
- [9] Chetty,R., Hendren,N., Kline,P. 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Recent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14(5):141-147

[10]Faux,J. Thomas Piketty Undermines the Hallowed Tenets of the Capitalist Catechism[EB/OL].EPIS, 2014-4-24

[11]Gould,E., Kandra,J. Inequality in Annual Earnings Worsens in 2021 Top 1% of Earners Get a Larger Share of the Earnings Pie While the Bottom 90% Lose Ground[EB/OL]. EPIS, 2022-12-21

[12]Saez,E., Zucman,G.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Income Tax Data[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2):519-578

[13]Webber,D. Firm Market Power and the Earnings Distribution[J].Labour Economics,2015(8):123-134

（责任编辑：李楠）